

心中有群众 反“四风”就有力量

日前,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剑指文山会海、“办事难”、公款吃喝、形象工程等7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严肃的态度、严格的标准、严明的纪律,反“四风”攻坚战号角吹响之际,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共鸣。

反“四风”、树新风,也是近期各级领导干部面临的重大课题。随着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推进,不乏“亮丑揭短”的民主生活会,触及灵魂的对照检查材料,开诚布公的自我剖析,让不少领导干部或多或少地出了些汗,有人深夜扪心自问,写到“几次流泪”。

不过,流汗或流泪,都还不是最终目的。查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领导干部的深切之思、痛切之情,还得落到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来。治理“四风”,既要揽镜自照,也要用好群众这面明镜。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和部门

暴露的问题不可忽视。有群众办个异地养老保险转移和退休手续,近3个月在市县两地跑了11趟,办事如此折腾人,岂不是官僚主义的典型症状?一些领导干部一边检查“四风”,一边又在制造新的文山会海,豪华办公楼更是让百姓瞠目结舌,动辄投资数十亿,还有什么“世界之最”的响亮名头,百姓轻易进得了这样的“衙门”?

多一点现实观照,多一些群众视角,我们对不良作风的反复性、顽固性就会有更深的认识。这也反过来说明,“四风”改没改,百姓说了算。要动真格,就要看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否真的解决了,群众反感的不良现象是否遏止了。

心中有群众,反“四风”就有了力量,一则是压力,一则是动力。作风建设既要治标也要治本,顺应群众期待,让人民真正满意,既看专项整治“攻坚战”的成果,也看管理和服务的常态。此前的不少经

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四风”积弊已久,如果不扎紧制度的笼子,不用机制规范权力的运行,就可能致不良作风的“隐形”生存、反弹回潮。正如一位领导同志指出的,改作风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涉及权力运行和利益调整,本身是一场深刻的改革。

管住乱吃的嘴、乱跑的腿、乱伸的手、乱建的楼,让勤俭务实之风传遍开来,从表面看是约束和规范干部个人的行为,从深层看,则意味着观念变革、制度创新和权力规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公务接待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各项制度建设,就能从根本上铲除“四风”滋生的土壤、增强对不良风气的免疫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四风”是一场脱胎换骨的自我革命,针对“四风”的攻坚战,也是一场改革攻坚战,是对我们改革精神、勇气和智慧的一次检验。而这,比流汗、流泪要艰难得多,也痛苦得多。从

严治党,民之所望,政之所兴,我们只有不畏艰难深化这方面的改革,才能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牢记共产党人执政兴国的出发点:为人民服务。

过去,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朴实的制度,其主旨就是把人民高高举过头顶,各级干部严格自律,甘当“勤务员”。唯其如此,党和人民才能紧紧抱成一团,激发无穷伟力。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惊叹共产党的队伍“对人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这样的仁者之师、人民政党,何坚不摧,何功不克?今天,面对改革发展的难题与挑战,共产党人需要新时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更加科学完善的制度实现自我净化、自我革新,继续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方能取得历史征程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这是90多年不变的党心,也是13亿人民殷切的民心。

李泓冰

“掐尖”带来教育失衡

据媒体报道,武汉市一些普通小学的“尖子生”会被其他优质小学以“转学生”的身份挖走。谁也不会想到,这股“择优”风气早已经从高校招生蔓延到中学考录中,以至于现在竟然出现小学都要“掐尖”的现象。

之所以“掐尖”蔓延,无非是学校通过聚拢优质生源来实现教学成果“丰硕”之目标,进而达到教学质量能够“名声在外”的最终目的。这种功利性目的体现最明显的莫过于高中招生,尤其是在一些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欠发达地区,往往会出现一个县城几所高中中只有县一中的生源“兵强马壮”,而其他几所高中基本上“青黄不接”。

社会上学生家长也会因此对这些好学校更加趋之若鹜,这无疑更加拉大了学校间的差距,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其实,在这个恶性循环中,受伤的不仅仅是那些师资力量不强的学校,就是那些每年在升学考试中都能风光独占的“一中”、“一小”也不轻松。承载的荣誉和所受到的压力都是同等的,高处不胜寒,占尽生源好的优势,所以必须出更好的成绩。因此,在这些优质学校,师生的压力同样是巨大的。

“掐尖”的招生模式不仅仅加剧了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衡,也对一些不那么拔尖的学生造成了影响。试想,当一个班级中的一些学生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或者其他综合素质比较好而早早被一些优质小学挖走或提前“预定”,那些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该作何感想?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种由于所谓的“差距”带来的挫败感?

无疑,基础教育领域的管理者面临着选择的困境——是维护教育公平,让所有的学生都有接受均衡教育资源“灌溉”的机会,还是重点培育支持一所或几所所谓的重点学校,让其“一枝独秀”,占尽风头?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曾说:“教育是一扇门,推开它,满是阳光和鲜花,它能给小孩子带来自信、快乐。”这应该是中小学教育的本义和功能。而目前一些中小学中存在的“掐尖”行为,已经严重伤害了一些原本充满自信和天赋的孩子的心灵。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该对这种“掐尖”带来的弊端有所警惕,及时调整中小学招生过程中的地方政策,规范学校的招生行为,淡化家长的择校意愿,从整体上缩小“掐尖”带来的教育机会失衡,真正落实教育公平。

王永

考察性出访应令行禁止

中央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四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加强制度建设的通知》,其中有一条规定是,严格控制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

“出国考察”,一直是许多官员公款出国的常用说法。“考察”,天生一副办理公事的架势。但是现在,它被中央叫停了,而且是一刀切,很决绝。

这里所谓一刀切叫停,并非不分清红皂白地禁止任何类别的领导干部出国,而是叫停“考察性出访”。所谓“考察性出访”,应当是相对“事务性出访”而言,后者是具有公务要办,而前者却“无明确目的”,无事可办。

既然无事可办,出国考察就是浪费公款,国家予以明令禁止,就是理所当然的。

但必须注意的是,此次禁止性规定并非我国第一次叫停“考察性出访”,而是屡禁屡弛,可谓令行而长期禁不止。比如1991年,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访问的补充规定》,其中规定:“领导干部出访的目的要明确,要讲究实效,组团要少而精,主要进行对口会谈或工作会晤。凡地、司级干部能够解决的问题,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就不必出访,一般性考察要坚决停止。”而实际上,这一禁令长期未能落实。

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很多地方或部门的相关文件,比如多省文件规定:厅(局)级人员原则上每年出国(境)不超过1次,访问一个国家(地区)一般限于一周之内,等等。这正是典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对出国考察的认识问题,另一方面是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在中国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到处充满“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话语,官员出国被认为是开拓国际视野,有利于他们归来建设和服务。而在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出现干部借口“出国考察”假公济私的情况,就不足为奇。

今年7月,中国教科院院长袁振国被曝2011年末曾赴阿根廷、巴西考察,10天考察期内除10小时公务活动外,其余均为包括赌场在内的游览行程。袁振国强调,自己出国一切“根据外事规定办理”。明明是假公济私,但因为有关文件撑腰,某些领导干部做起来就能心安理得。

要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首先必须坚决彻底清理各种与中央规定冲突的“对策”性文件,实现政令的统一。对于“考察性出访”,既然中央文件已经明令禁止,地方或部门文件就不得以“因地制宜”等为由,再开口子。

但光堵住“出国考察”的漏洞还远远不够,因为某些官员脑筋急转弯的聪明劲儿往往出乎一般人的意料。2008年,浙江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徐某曾带着一个“23人赴美培训团”出国,实质却是公款旅游。但他们打的旗号不是“考察”,而是“赴美培训”。

为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考察性出访”、“出国培训”之类出国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避免某些官员故意混淆相关概念,暗度陈仓。

京文

众乘客成“看客”,根子在哪里?

因先后提醒两名乘客小偷行窃,10月14日下午,广东东莞106路公交车司机黄广现和售票员李玉凤夫妇被刺伤,黄广现手臂上连接握指的手筋被割断,直到现在握指还不能动。事发时,车上20多名乘客全都吓得躲向公交车尾部,没人敢伸出援手。(11月5日《南方都市报》)

按照一般做法,多是公交车司机不敢斗贼,因为其车号和线路都是固定的,害怕小偷以后上报报复,但是这对司机夫妇先是大声提醒乘客,而后是勇斗歹徒,双双受伤,那种履行责任的凛然正气和见义勇为精神值得我们深深敬佩。

再来看看这两个小偷,光天化日之下,众目睽睽之中,带刀行窃,疯狂伤人,其罪行已从小偷小摸转为持刀抢劫。更令人吃惊的是,刺伤黄广现,两小偷下车逃跑,乘客们纷纷打电话报警,可小偷又回来了。他们威胁全车乘客,又狠狠地砸烂了两个座椅,这才扬长而去。而更让小偷偷视若无物的是车上20多名乘客,一大半是男性,全都吓得躲向公交车尾部,没人敢伸出援手,“当我把手持匕首的小偷摁在地上时,只要有一个乘客上来帮我,我就不会受伤了。”黄广现回想那天发生的事情,心里仍有些不舒服。不舒服的岂止是他,大批的网友都在怒斥冷血,包括乘客自己也都深感内疚,坦诚没有勇气。

其实,当面对持刀歹徒的时候,怯懦与逃避是很多人本能的反应,而这种情绪是会传染的,成为一种社会群体症候。这一点我们没必要太过苛责。况且,乘客更现实的考虑是,此情此景,见义勇为可能



《法治周末》报道,国产心脏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心脏支架的到岸价是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价格涨到近2万元,利润堪比毒品。业内人士透露,保守估计,一个心脏支架给医生的提成在2000元左右。

腐败对于官场乃至整个社会的祸患之烈已被多数人认识和痛恨。以治病救人宗旨的医务界,也不断遭受着腐败习气的侵蚀,致使少数医务人员医德受损,只爱钱而抛弃爱心,招致许多患者的不满。时下各地医院医患纠纷的频繁发生,除了确有无理取闹的“医闹”骚扰滋事外,不少是与医务人员医德缺失有关。从医药及医疗器械中大肆捞取回扣的做法,是当前医务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吴之如

为出国造假到底输了什么

北京学生杨静(化名)申请学校,中介帮她制作了假的工作证明。后该校询问得知材料造假,直接导致了她的申请失败。中国学生申请材料造假成风让美国人警惕性越来越高,美国高校正加大对中国学生的审核力度。(11月6日《中国青年报》)

据报道,2010年,美国知名教育网站Zinch就曾公布报告称,80%的中国学生在申请时接受了中介公司的帮助和服务,而中介代理的相互竞争,导致了作弊、造假现象猖獗。在他们的调查对象中,90%的中国留学生使用了假的推荐信,70%的申请者的文书是他人代笔的,还有50%的申请者伪造了高中成绩单,10%的人列出了他们从未得到的奖励和成绩。

面对这样高的比例,难怪近年来一些国外高校加大对中国学生的审核力度,他们在传统的材料审核之外,通过面试审核或者办事处审核的方式,尽可能地面对面检验学生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学生与学校的契合度。多名美国院校代表提醒中国学生及家长,申请美国大学不应存有侥幸心理。根据美国的高校管理机制和诚信体系,任何申请赴美留学的造假行为都将后患无穷。材料作假就相当于给自己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也许10年、20年后,会突然被吊销学位。

一些学生和家长为顺利出国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中介正是读懂了这样的诉求,才会衍生出很多“办法”,进而形成利益链或者产业链,导致造假成风。即使侥幸成功,出了国门,就一定会无忧无虑、万事大吉吗?俗话说得好撒下一个谎要用一百个谎来圆。一旦露出破绽,就会面临国外更加严厉的惩罚,甚至难以立足。事实证明,有的学生即使成功进入学校就读,但因为实际水平无法跟上学校的学习进度,最后只好退学或转学到社区学院。所以,对于个人来说,材料造假注定是一个“输”的结局。

申请国外的学校,无形中给外国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的机会。无论是否走出国门,学生的行为代表的都不仅仅是个人,还有国家的形象。造假成风会让外国人对中国的学生群体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从一开始接触就会产生不信任和警惕的心理,这不仅不利于中国学生在国外的学习,更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树立的大国形象。这种集体不诚信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远比中国游客出境的不文明行为更深远。因此,出国造假当可止,对于不诚信的人,外国不欢迎,同样国内也不需要。宋华

减税才能真正增进民生福祉

2011年末曾赴阿根廷、巴西考察,10天考察期内除10小时公务活动外,其余均为包括赌场在内的游览行程。袁振国强调,自己出国一切“根据外事规定办理”。明明是假公济私,但因为有关文件撑腰,某些领导干部做起来就能心安理得。

要解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首先必须坚决彻底清理各种与中央规定冲突的“对策”性文件,实现政令的统一。对于“考察性出访”,既然中央文件已经明令禁止,地方或部门文件就不得以“因地制宜”等为由,再开口子。

但光堵住“出国考察”的漏洞还远远不够,因为某些官员脑筋急转弯的聪明劲儿往往出乎一般人的意料。2008年,浙江温州市纪委副书记徐某曾带着一个“23人赴美培训团”出国,实质却是公款旅游。但他们打的旗号不是“考察”,而是“赴美培训”。

为此,有关部门有必要对“考察性出访”、“出国培训”之类出国概念作出明确界定,避免某些官员故意混淆相关概念,暗度陈仓。

京文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应对出口放缓造成的制造业疲软,国务院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笔资金投入铁路、公共设施、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稳增长的目标。据高盛集团经济学家哈维分析: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使得投资占GDP比重高达50%左右;而投资效率则在明显下降,边际投资效率,即GDP增量与投资之比,由2008年前的0.35已下降至2012年的0.19。如此依赖投资提振经济,也侧证了内需不振。

内需不足,消费并不给力,在于广大工薪阶层收入有限。虽然最低工资标准逐年上调,但工资增长怎么也跑不过物价上涨。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兰纪平在11月4日《中国青年报》撰文指出,论以实际购买力,人民币对内贬值,八年间,1000元已缩水至576元。在通货膨胀情势下,受影响最大的也就是广大工薪阶层。

去年,《中国企业家》杂志有过权威调查,高达63%的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身税负较重,甚至在制造业中,有23%的企业表示其税负与利润的比率在100%以上。今年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则显示,全国24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100多家公司上缴的税费是其净利润的5倍以上。这就更遑论中小企业的税负压力以至生存压力了。

李克强总理日前在中国工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经济形势报告》称,“简政放权”,“半年多来,中央政府下大气力已经取消和下放221项审批事项”,这释放出鼓励民众就业、创业的积极信号。与之相匹配的是,还需要尽快启动对企业和职工的减负减税,以激发各类企业的市场活力,使之轻装上阵。虽然一些单项赋税得以减免,但是,由于拓展了税源,总体上税收收入未必下降。所以,要真正减轻企业的税负,以利于企业提高职工的收入和福利,进而,通过让利于民、藏富于民,实现内需的提振和经济结构的逐步调整。毕竟,经济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有效增进民生福祉。

于立生

你可能不知道的哈佛新生

由学生经营的《哈佛深红报》对2013届哈佛新生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非官方”调查,内容包括他们的背景、行为以及意愿,共回收了1311份问卷(覆盖了该届新生的近80%)。现挑选出部分调查亮点如下:

“81%的被调查新生表示,他们就读的是自己的首选大学。新生们平均申请了6.57所大学,并被4.68所大学录取。”

“半数以上的哈佛新生来自家庭年收入1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相比之下,最近的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仅为约5万美元。”

“10%的被调查新生承认自己曾在考试中作过弊,17%的人承认自己曾在论文或课后大作业中作过舞弊行为。还有更高比例——42%的人承认曾在做家庭作业或习题时‘做过手脚’。”

“82%的人认为最大的压力源于自己。只有8%的人将父母视为最大的压力来源。不过,并非每个人都那么不轻松——7%的被调查者称,他们毫无压力。”

“48%的男性新生期望大学毕业后第一年能挣7万美元以上,而仅有28%的女性新生预计自己可以达到7万美元以上。”

这种“非官方”、不那么严谨的调查,往往“很有料”,也能让大学管理者们从中大致了解其学生群体究竟是什么样的。

哈佛也许并非某些学生心目中的“第一名”,影响他们作出选择的因素中,包括不同的环境、大学所在地,或其他举足轻重的特质。调查显示,这些学生并不单单基于大学声誉便作出了首选决定。同时,它并不表示,那19%不把哈佛当“第一选择”的学生在这儿就会过得不开心、对学校不满意。

哈佛以其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多样性为广告,然而,当它的学生大部分来自收入在前1/5的家庭时,也就谈不上什么“多样性”“多元化”了。哈佛学子中,中上层阶级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大部分人在在成长的过程中从未被贫穷的阴霾笼罩过。但我们不要忘了,许多移民家庭,如我自己家里,在父母留美读研期间便经历长达数年的“伪上流阶

你不可能不知道的哈佛新生

级”的穷酸生活,年收入12.5万美元是长时期努力的结果。

尽管来自乡村地区的学生整体而言,更趋于有接受经济资助的需求,但我肯定,最大的经济资助“礼包”会有相当一部分分给了城里的孩子。一些来自城市贫民区的哈佛同学,家里所拥有的方便极其有限。仅仅是“住在城里”这一条,并不说明你家就有上大学的财力。中国大城市中,流动务工人员的孩子们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至于调查显示的学生作弊与高期望,这二者之间也有关联。当你给自己许多压力时,你可能会不顾一切、不计手段地想要成功。对许多人来说,这意味着投机取巧,或者说作弊。对此,我无法苟同,但也能理解在何种情况下会伴随着压力而产生此类作弊行为。心理健康在哈佛是严重的问题。哈佛与其他大学应该提供的,是缓解这种压力的宣泄口。尽管大学不应对此负全责,但有义务去创建一个支持体系并向学生提供帮助。

关于女性之间的薪资“鸿沟”,此前便有研究显示,男性更趋于过高估计他们应得的薪资水平,不管他们值不值那个价码。另一方面,女性则对自己的成就谦逊多了,在谋求报酬时也比较低调。调查所揭示的这一事实表明,即便在高等教育的顶层,对男女的性别看待依然存在。哈佛女性,正如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女性一样,还需要被赋予更大的权利。大学能够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如针对歧视的开放性对话,相对平衡的教职员工性别比例,关于鼓励男性认同女性以及鼓励女性赋予自己更多信心的工作。

最重要的是,学生特征与期望方面的显著变化,能够帮助大学管理者找准本校的系统性问题,更好地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有利于其适应的环境。但说到底,新生们并不只是一串数据,而是一群不能被简单粗暴化为数字的鲜活个体。大学的管理者们、教师们、家长们以及“围观群众”,都需要认识到,他们中的每一位,都从一个独特的环境中走来,有着与众不同的心理脾性。

王可